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批准号: 95CSH04003)

河南省农村社会教育问题研究

课题主持人: 王凌彬

主持单位: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

二〇〇〇年九月

前 言

我省是农业大省，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农村社会教育落后，农民整体素质低下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总根源。在农业现代化这项跨世纪的系统工程中，农民无疑是完成这项工程的能动的、首要的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而农村社会教育就是着眼于提高农民素质，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四有”农民的基础工程。目前，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农村第二轮改革已全面展开，我省正在进行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些都对发展农村社会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课题立足我省实际，着眼于农村的全面发展，从农村社会教育的角度来审视农民素质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全面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教育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并对进一步搞好农村社会教育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本课题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突破口，旨在通过对农村社会教育问题的分析研究，找出我省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为农村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课 题 组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目 录

一、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农村社会教育的基本成就	1
1、农村社会教育蓬勃发展, 生机盎然	1
2、农村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3、农村社会教育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6
二、河南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特点	7
1、从思想观念上看, 正由封闭走向开放, 从“虚空” 走向务实	8
2、从教育方法上看, 正从单项型教育向综合型教育 转变	9
3、从教育设施上看, 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10
4、从教育途径上看, 走向了多途并进	10
5、从主客观关系上看, 正从主体强制灌输性教育向客体 自主需求性教育转变	10
三、河南农村社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1、发展水平不平衡	11
2、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12
3、管理涣散问题比较普遍	12
4、农民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13
5、其他社会势力冲击着农村社会教育	13
四、影响河南农村社会教育因素分析	14
1、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农村社会教育	14
2、政府职能变化与农村社会教育	15
3、村民组织与农村社会教育	16
4、农民的流动、分层与农村社会教育	17
5、农村家族、宗族与农村社会教育	17
6、农村经济文明建设与农村社会教育	18
7、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教育	19
五、推进河南农村社会教育的措施	20

1、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变革文化教育观念·····	20
2、量力而行，分步实施，规划建设农村社会教育·····	20
3、立足实际，发挥优势，推进农村社会教育·····	22
4、正确指导，正面引导，规范农村社会教育·····	23
5、专兼结合，稳定队伍，保证农村社会教育的活力·····	23
6、加强管理，提高效能，管好农村社会教育·····	24

河南农村社会教育问题研究

推动农村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培养现代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农村教育是必由途径。

农村教育实际上包括农村学校教育、农村家庭教育和农村社会教育三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农村学校教育是农村教育的主体，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又有着学校教育所不能取代的地位。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以“村民自治”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社区政治的发展，农村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以政府行为为主导比较完善的学校教育系统；以家庭为单位，以观念开放为标志的家庭教育系统；以形式多样、影响广泛为特征的社会教育系统。其中，以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变化最为明显，它以多元化、广泛化、立体化、复杂化等特点向农民日常生活渗透，影响和改变着农民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方式。

我省是农业大省，乡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4.5%，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针对发展中的农村社会教育，如何正确引导和进一步带动推进，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相一致，是摆在我省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农村社会教育的基本成就

1、农村社会教育蓬勃发展，生机盎然

(1) 农村社会教育设施明显增加，队伍日益壮大

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要依托是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图书室、村文化大院等。1978年，我省县级文化馆仅有140个，到1997年增加到198个，人员增加到3150人；县级图书馆1978年仅有20个，到1997年已增加到116个，人员增加到1541人；

乡（镇）文化站1978年仅46人，到1997年已发展到2101个，文化站专职工作人员已达到2371人。我省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乡镇有532人，5万人以下的乡镇有1780个。按照省编委[1995]17号文件规定的指数，乡（镇）人口在5万以上的可配置文化站专职干部3—4人，5万人以下的可配置2—3人，全省可配备8716人，在现有人员基础上可增加编制6354人，乡（镇）文化队伍将明显壮大。到1997年底，我省已建成的8000个小康村中，基本上都有固定的文化设施，电视入户率达到80%以上，人均文化用品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接近12%。据调查表明：在我省，73%的村有1—3间房用于开展文化活动，有45.3%的村建有文化室；有45.13%的村建有图书室，54.96%的村有固定性体育活动场所，有57.11%建有广播室。

到1997年底，我省的济源、辉县、汝南、淅川、林州、项城、新密、陕县、邓州共9个县市成为“全国文化先进县”；舞阳县、内黄县、汝南王桥的农民画、浚县泥玩具、开封柳园口乡的盘鼓已享誉国内外，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济源、辉县、汝南、淅川、项城、新密、陕县、邓州、开封、商水、修武、孟津共12个县（市）被命名为第一批“河南省文化建设先进县”；有110个乡（镇）文化站成为我省的“百强文化站”；有8个县、乡、村被命名为我省首批“河南省民间艺术之乡”；我省陕县大营村儿童文化园1995年被文化部命名为首批“全国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试点”，带动了陕县温塘村、临颖南街村、鹤壁郊区郝荒村等创办农村儿童文化园建设的积极性。这三个农村儿童文化园，1996年已成为省级农村儿童文化园试点单位。

（2）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坚持上山下乡

我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多年来坚持送戏上山下乡，特别是县级剧团，更是长年奔波于乡镇农村，十几年来，在农村演出场次年均3万余场，在全国艺术表演团体送戏下乡中名列前茅。例如县级艺术表演团体的先进集体鄢陵“板车剧团”，六十年代就是全

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八十年代后，他们锐意改革，积极探索，使板车精神发扬光大。近年来，该团为农民演出年均在600场以上，他们在送戏下乡中所做的好人好事被广为传诵，农民兄弟称他们是“庄户人家的好剧团”。

（3）农村文化市场得到进一步培育

随着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农村文化市场随之兴起。在城市文化市场带动下，农村文化市场活动日益丰富，项目和门类日益增多，除传统的戏剧、电影外，舞厅、录像厅、台球室、书报刊摊点等文化经营项目在农村地区逐渐出现，而且总量在逐渐增大，效益逐渐增长。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村文化市场已初具规模，水平明显提高，成为农村文化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极富生机活力和发展前途的一个部分，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管理工作逐步加强，初步形成了县、乡两级农村文化市场管理网络。有些地方已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工作网络，如临颖县构建的“两校两网”（即乡镇党校，文明农民学校，广播电视网、书报发行网），极大地促进和巩固了农村文化市场。如今，临颖县15个乡镇党校和全县361个村的文明农民学校都办得有声有色；调频或有线广播覆盖每个乡村，全县60%以上的村已接通了有线电视。

（4）富有特色、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日益活跃。

据占全省村总数7%的3346个村的调查数据汇总，进入九十年代后，与1985年相比，村一级各类文化体育活动总场次增加了35%，除戏剧演出略有减少外，其他各种文艺形式，包括电影、投影、曲艺、歌舞、杂技、驯兽、民产艺术表演等，都呈上升趋势。除了村民群体参与的文化活动类项外，农户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自费订报人数已占农民总人数的5.67%。

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和其他文化实体，乡镇文化站（中心）、乡（镇）图书馆和其他文化实体，村级文化大院或文化室，农民俱乐部等文化实体以及社会上个人投资、集资、外资、合资等由社会力量兴办的文化实体共同构成农村文化阵地。这些

单位和实体除了日常开展的阵地活动外，每逢元旦、春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节日，都要举办单项或综合的专题文艺体育活动。县级文化馆仅1991年一年就举办各种展览8470个，组织文艺活动1933次。在大文化格局中，民间社火这种传统的农村文化形态也在重新萌生，并有着广泛开展的前景。开封的盘鼓，遂平、西平、郟县的大铜器，新乡的大鼓，三门峡的“百佛顶灯”也焕发青春，打遍大江南北，饮誉海内外。在1991年至1994年“沈阳国际秧歌节暨全国优秀广场舞蹈邀请赛”中，我省开封郊区大李庄盘鼓队、开封县袁坊盘鼓队、郟县大铜器队和三门峡市湖滨区向阳村的“百佛顶灯”等代表我省参赛，连续四年夺得最高奖——金玫瑰奖，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我省农民的艺术风采。新乡原阳县原武镇文化站的盘鼓队和获嘉县王官营盘鼓队，开封独乐岗盘鼓队在全国“龙潭杯”全国优秀民间花会大赛中年年夺魁。我省开封县大李庄盘鼓队1994年走出国门赴日本参加对外文化交流，赢得空前喝彩。这些由农民组成的盘鼓队，打出了中国农民的气势，表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省农村的精神面貌，为我省赢得了很高荣誉。1995年，我省陕县大营村儿童文化园排演的少儿舞蹈《剪花花》和器乐合奏《泥娃娃操起了洋玩意》，代表我省参加全国“农村娃”进京调演，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和首都观众演出受到一致好评，此外，我省还有文化专业户1.2万个，民间艺人1.1万多名，作为农村文化的一支补充力量，也为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发挥着积极作用。

2、农村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社会教育对于农村经济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农村“四有”新人。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包括更新思想观念，提高科学水平，知识程度，技术技能，艺术修养、审美能力、高尚情操等。二是体现在社会教育工作中的舆论宣传，信息传递、安定社会心理等，这些与经济都有着直接联系。十几年

来，我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随着“大文化”观念的确立，明确地把推广科学技术，服务经济建设列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重要考评条件。电影系统近年来始终重视科教电影的进村入户，多次组织全省性“科教电影月”或“科教电影周”活动。各市（地）和绝大多数县的文化部门也都把这方面的工作纳入了目标管理。由于各级文化部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提高了县、乡两级文化实体把本职工作推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自觉性，以鲁山、陕县为代表的一批县级图书馆，扎扎实实地开展科技咨询工作，一方面定点定课题，对科技人员实施跟踪服务，一方面急农民之所急，供农民之所需，坚持图书赶会，科技进村，成为当地“科技兴农”的支柱单位。南阳市图书馆为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同各县图书馆编制农田水利建设专题联合目录，发至各县，以供查阅，这项工作，乡（镇）文化站开展得更为普遍。泌阳县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文化站专干例会，围绕季节性农业生产，交流推广适路农业技术的工作情况。据统计，仅1991年一年，全省各县文化馆就开办各类科技知识培训班727个，参加培训的就有3.3万人次。

不少文化站成了农民脱贫的桥梁、致富的课堂。镇平县侯集镇是传统的蔬菜产地，镇文化站在1989年就组建了信息中心，该镇的科技信息网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300多个县、1000多个村，发展业余科技信息员1500多名；编印《科技信息》52期，发行35万份，同时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15期，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800人。通过科技信息服务，全镇涌现致富能手15900多人，增加经济效益3000多万元。

其次，许多村办文化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禹州市岳庄村文化大院，搞农业科技技术培训常年不断，有力地促进了庭院经济的发展；陕县大营村、温塘村，许昌的大地、南村，长葛县的后河，鄢陵县的贤庄，焦作、新乡的小康村，都把文化大院办成了致富课堂，引导农民走上了科学种田和

从事商品经营的发家之路。

除此之外，近些年各地农村在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服务方面，都有不少探索和成功的经验。如有的地方举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类节日，如“沁阳唢呐节”、“济源红果节”、“原阳大米节”、“灵宝金果节”、“郟县黄牛节”等，融文化和经贸为一体，这种大型社会文化活动的组织，既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又为宣传和弘扬地方文化，促进地方经济贸易，走出了经济文化发展一体化的路子，普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些县乡把建文化设施，开展文化活动，作为地方文明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外部环境的一项必要措施，为吸引外资，引进人才，提高本地知名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3、农村社会教育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社会教育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这一任务要求，我省各级文化部门发挥社会教育这一不可替代的优势，用不同的文艺形式，对政治，时事进行宣传，对进步思想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进行传播，用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通过熏陶、感染、陶冶、启迪等方式，对人们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精神状态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大农民通过参加健康有益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振奋了精神，开拓了视野，增加了知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精神境界，寓教于乐，寓教于一切文化艺术活动。

我省的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大院，活动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配合农村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利用农闲和传统节日、庙会等有利时机，运用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如禹州市文殊镇开展的“五进家”活动（即

政策进家、科技进家、法律进家、文化进家、卫生进家），对全镇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二是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平顶山市湛河区实施文化驻村工程，使文明之风在农村生根开花。全区目前已建成文化大院52个，72%的行政村都有了文化大院。文化大院吸引了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产生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近年来，全区共拆毁大小庙堂15座，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赌博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好人好事不断涌现，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许昌县苏桥乡过去封建迷信、打架、赌博，拦路扒车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象一度非常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各村的文化大院集中时间进行普法宣传，利用文化活动活泼、易于被群众接受的特点，宣传法律知识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有效地减少赌博，打架，滋事等不良现象和各种犯罪活动的发生。三是寓教于乐，开展经常性的文体娱乐活动，如电影、录像放映、民间艺术表演、吹拉弹唱、体育竞赛等，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培养集体主义观念，陶冶他们的情操，密切干群关系。在我省农村，普遍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婚丧嫁娶提倡简办，易风移俗；另外还开展了“星级文明户”、“好媳妇”、“五好农户”等评选活动，在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破除迷信、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都收到良好效果。实践证明，农村社会教育已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大院（室）已成为农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

二、河南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特点

从以上对我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教育的情况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我省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教育，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方法、教育设施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社会教育初具规模，水平明显提高，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前沿阵地。少数发达地区，教育设施完备，技术先进，组织有力，方法得当，提前进入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说，我

省目前的农村社会教育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从思想观念上看，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虚空”走向务实

市场经济的开放型特征使农民冲破了封闭的时空界限，打破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以新的思想观念来认识和看待问题。这主要得益于：一是传媒的发展。随着电视入户率的提高和有线电视的安装，打破了农村自然的封闭状况，农民能及时了解到外界的各类社会信息。二是务工潮的流动。大批农工涌入城市，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提高了生存能力，对农民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是科技文化的下乡。科技文化下乡，不仅带来了文化，带来了科技，而且也带给农民先进的思想，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四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正确引导。这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临颖县着力构建的“两校两网”，禹州市文殊镇开展的“五进家”活动，还有如三门峡市开展的农村政策法规纪教育活动等都是以政府部门为依托，对农民思想观念进行正确引导的活动。

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使他们走出了小农意识的樊篱，走出了以家庭为圆圈、小富即满的思想，以开放、竞争、共同致富的积极心愿走向共同富裕，如社旗县大冯营乡李庄村农家妇女李松云在村里设立“科技致富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松云是位普通的农家妇女，近年来她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靠科技种烟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烟王”。为帮助全村妇女科技致富，一遇农闲她就挨家挨户宣讲党的农村致富政策，传递科技信息，引导众姐妹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1999年10月，她决定在村里设立“科技致富奖”，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全村姐妹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奖品非常独特，既有化肥、良种，又有小件农机具，科技图书等。像李松云这样的例子在我省农村还有很多，从中可以反映出目前农民思想观念上积极健康、开放向上的心态。

开放的思想也使农民更加务实。务实，实际上是我国农民传统的精神之一，讲究实际，追求实惠，诚实，实在。但这种务实

精神一度曾因精神上的虚空（如“三请示”、“三汇报”等）而失去了实际意义。如今，农民喜欢参加科技讲座，喜欢学习烹饪、裁剪、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使传统的务实精神与现代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伊川县学科技用科技，开展的“百日科技兴农活动”就是一个缩影。伊川县从1999年起积极实施科技兴县活动，大力推行“百千万”农业科技示范工程（100个科技示范村，1000个科技示范村民组，10000个科技示范户），今年春天又开展了“百日科技兴农示范活动”，活动中举办科技集市20余场次，举办培训班60余期，接受培训农民计约10万余人次。引进推广脱毒甘薯繁育、烟叶漂浮育苗、秸秆生化饲料等13项农业新技术，倍受农民群众欢迎，被农民群众称之为“及时雨”。

2、从教育方法上看，正从单项型教育向综合型教育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统包统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旧体制，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个体经济的迅猛发展被彻底打破，农村社会教育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投资、经营的多渠道、多体制和多层次发展的崭新格局。不仅如此，由于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教育对象也变得复杂、多样，教育的内容也从主导文化中开始分流，走向多样化和多变化。因而使教育方法逐步转变为多种方法综合运用，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教育，使社会教育走向了综合性、广泛性。周口市实行的县、乡、村“三级党建联创”活动，不仅使农村基层组织得到了加强，更使社会教育有目标、有责任，形成了目标管理网络。平顶山市湛河区实行“自成体系，封闭运行”开展农村工作，探索出一个农村社会教育的新模式，运用这种模式，全面开展了“文明村”、“双文明户”、“文化大院”的创建活动，评出了9个文明村，500个双文明户、建起了48个“文化大院”。罗山县东铺乡妇女自发组成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乡、村、组三级妇女禁赌协会，她们通过开戒赌会、焚赌具、抓赌点、规劝说服教育等形式，使一批批赌徒告别赌桌，办起了致富项目。这些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成为农村社会教育的有效载体，使农村社会教育向着综合性、广泛性迈进。

3、从教育设施上看，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在农村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村社会教育由过去的单一福利型向效益经营型转变，实行“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开展了各种有偿服务，并不断拓展经营范围，使社会教育设施的分布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格局。其中农村文化馆、站、中心作为主干设施，在农村社会教育中仍发挥着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与农村影剧院、新华书店等一起成为农村社会教育的主力军。其他如录像厅、文化户经营的文化室等，以其经营范围广，方法灵活，形式多样作为主干设施的有益补充，也已成为农村社会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由于其较为适合个体联营，因而更为普及。这不仅有利于农村社会教育自身实现转轨，走上按市场经济规律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道路，而且开发了农村社会教育的潜力，带动了社会各界投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

4、从教育途径上看，走向了多途并进

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教育活动仍以政府为主导，文化馆、站为主要载体，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传媒的不断发展真正拓宽了农村社会教育的途径，过去那种“一张嘴，一个本，一只笔”的传播方式已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运用多种载体，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普及性已成为趋势。如今不仅电视入户，报刊进家，而且计算机也入“门”了，网络传播在城市热的同时，在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其他如农村乡镇的三日一墟，五日一集，既是农贸交易日，也是教育活动日，电影院、书市、录像厅、电子游戏室全面开放，使教育途径多头并进、全面开花。

5、从主客体关系上看，正从主体强制灌输性教育向客体自主需求性教育转变

随着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农民自觉接受教育的意识也得到了现实提升，社会教育一改过去那种“你教我学”被动方式，而被根据农民需要而教育的方式所取代。农民自主接受教育已成较为普遍的现象，或外出学习专门技术，或在本地拜师学艺，或跟

着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学习。总之只要他们认为某一门技术实际有用，就能调动其学习意识。在这种需求意识确立的过程中，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榜样力量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目前，遍布农村的各类专业村很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前面提到的社旗县农家妇女李松平在村里设立“科技致富奖”就反映了农民这种自主需求性的转变。商丘市梁园区周庄乡解放村在致富以后能够反骄破满，“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在全村形成了一个崇尚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良好村风，培育出一个乐观、豁达、自信，充满上进心的新型农民群体，更以群体性证实了这种转变。

三、河南农村社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省农村社会教育十几年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对于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发展水平不平衡

我省贫困县市比例较大，贫困人口较多，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比例更大；山区面积较大，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使农村社会教育呈现出不平衡性。一些开始进入小康阶段的农村，全民、集体、私营文化企业协调发展，互相竞争，多层次、多门类、多形式的社会教育体系已露雏形；少数正在接近或达到富裕阶段的农村地区，社会教育形式更加多样化，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比较成熟的农村社会教育体系。但在广大的山区、老区和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社会教育力量相当薄弱。据我们调查，到目前，仍有许多乡没有文化站和专业文化工作人员，更多的乡没有农民协会，更谈不上开展各种活动，许多乡没有乡办图书馆，村办图书室数量也很少，平均每个乡只有5个。同时，山区和平原地区，偏远地区与城乡交接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对比强烈，落差明显。

2、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农村经济建设的逐步升温与农村社会教育的薄弱、滞后形成强烈反差。与迅猛发展的城市社会教育相比，农村社会教育还显得稚嫩和脆弱；投资、管理、经营和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还没有形成，发展后劲不足；在规模、维度、档次、效益和对群众的影响程度等方面与广大农民的实际要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还很不协调。据统计，1997年全省还有2个县没有图书馆，9个县有馆无址，11个县的面积不足200平方米，5个县（市）不足300平方米，12个县（市）不足500平方米；县级文化馆中，有5个县（市）有馆无址，有7个县（市）面积不足500平方米，有9个县（市）不足800平方米；还有部分乡级文化站至今仍被挤占或挪作他用，部分文化馆、文化站建设的滑坡局面还没有根本得到遏制。文化站的编制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从列编到文化专干编制的落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村级文化大院还没有全部普及，群众看戏，看电影难的问题仍还比较突出。这些都反映出，我省农村社会整体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跟不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3、管理涣散问题比较普遍

农村社会教育实施范围大，对象广泛而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农村各级领导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注重抓经济建设，不注重抓思想建设，导致组织领导弱化；法律法规和具体措施不健全、不完善，运行起来难度大；效果评价标准模糊，缺乏准确的考核依据，操作起来困难大。因此，在管理上普遍存在着管理手段落后，规范化水平低的现象，个别乡镇文化站还没有建立或缺乏专职人员，处在放任自流状态。

在管理涣散问题上，农村基层尤为突出。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户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土地分到户，不要村干部”，许多村干部也就放松了对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和对自身的要求。有些地方的村干部整天忙于私事，对村里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些地方的村干部只顾自己做生意挣大

钱，没有一点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思想；有些地方村干部对党的政策不宣传，对封建迷信不抵制，甚至带头搞封建迷信，在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引起很大负面影响，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吃喝贪占欺压群众，肆意加重农民负担，违法乱纪，使干群矛盾异常尖锐。而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最直接、最广泛，基层组织管理散涣，最容易导致干群矛盾的滋生，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

4、农民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传统习惯和封建残余思想，保守思想的影响较深，都是农村社会教育发展的阻力，但相对来说，更大的阻力来自农民自身，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主观上存在着对农村社会教育认识不足，不重视不支持等问题。据调查显示：在我省农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05%，高中文化程度也只有5.22%，小学文化程度占39.86%，文盲半文盲占11.89%，其中，后二者之和为51.75%，已超出了半数。由于文化层次的差异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使一些农民在思想素质上的表现为思想僵化，小农意识强；缺乏现代意识，民主法律意识淡漠；目光短浅，利益目标层次低，行为短期化；处事斤斤计较，又难以驾驭自身。因此往往看不到社会教育的好处，不但不积极参与支持，甚至个别地方还有抵触情绪。当然，造成这种后果，除农民自身认识不到位外，还有多方向的原因：一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滞后不适应农民的思想需要；二是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利益引导；三是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要求不相适应，脱节严重；四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观念的消极影响。

5、其他社会势力冲击着农村社会教育

在广大农村，由于民主法制教育的相对滞后，家族宗法关系的直接影响，封建迷信和邪教势力的强力渗透和少数不法之徒违法乱纪行为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农村社会教育受到严重的冲击。特别是近几年在城市文化市场强大的管理攻势下，“黄、赌、